

← (上接8版)

物世相的熟知,而他对不同人物的把握和刻画又有欲效仿《红楼梦》的格局之意。只需将小说中的人物拿出来略加对比,就会发现作者非但没有存心毁谤赵氏一家,甚至还处处哀怜他们,认为他们太忠厚老实,简直不配吃堂子饭。

胡适又引末尾赵二宝被史三公子遗弃,吃尽苦头,被恶客打伤了,昏睡做了个梦,梦见三公子派人来接她。她梦中向她母亲说的一句话,胡适认为这19个字,字字是血,是泪,真有古人说的“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风格,而这部《海上花列传》到此戛然而止,也别有一番意味。单凭这19个字便知,这部小说并不是一部什么“敲竹杠”的书。

《海上花》的文学价值：兼及张爱玲对小说的一些论说

胡适采用先假设后求证的方法为作者辩护,逻辑严密而言之有据,不但为作者的人格正了名,还使得小说的创作意图摆脱了那些诬蔑的说法。胡适在《〈海上花列传〉序》中的后两部分,则着重谈到了这部小说的文学价值。胡适对于它的赞许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小说的结构和技巧。或许由于因缘际会,郑振铎在旧书摊上偶然求得最初登载《海上花》的《海上奇书》这本绣像小说,这不仅使得胡适得以直观地了解《海上花》最初版本乃至所配插图,更可宝贵的是《海上奇书》保存有《海上花列传例言》,其中有作者对他在写这部小说时的手法的说明,作者说全书笔法从《儒林外史》脱化而来,而穿插藏隐之法为从来所未有。胡适评论认为,《海上花》在叙述结构上确实优于《儒林外史》,后者仅仅是一串短篇故事的简单叠加,而前者虽也是短篇故事,却有综合的组织。韩子云将几个故事打通,叠加在一起,并让它们同时进行,这种作法在当时可谓是一项实验。

二是作者对人物的刻画。前面曾提及这部《海上花》形形色色的人物,胡适认为小说中对于不同人物的刻画十分有特色,个性鲜明,作者笔下的人物“无雷同,无矛盾”,这可算是此书的一大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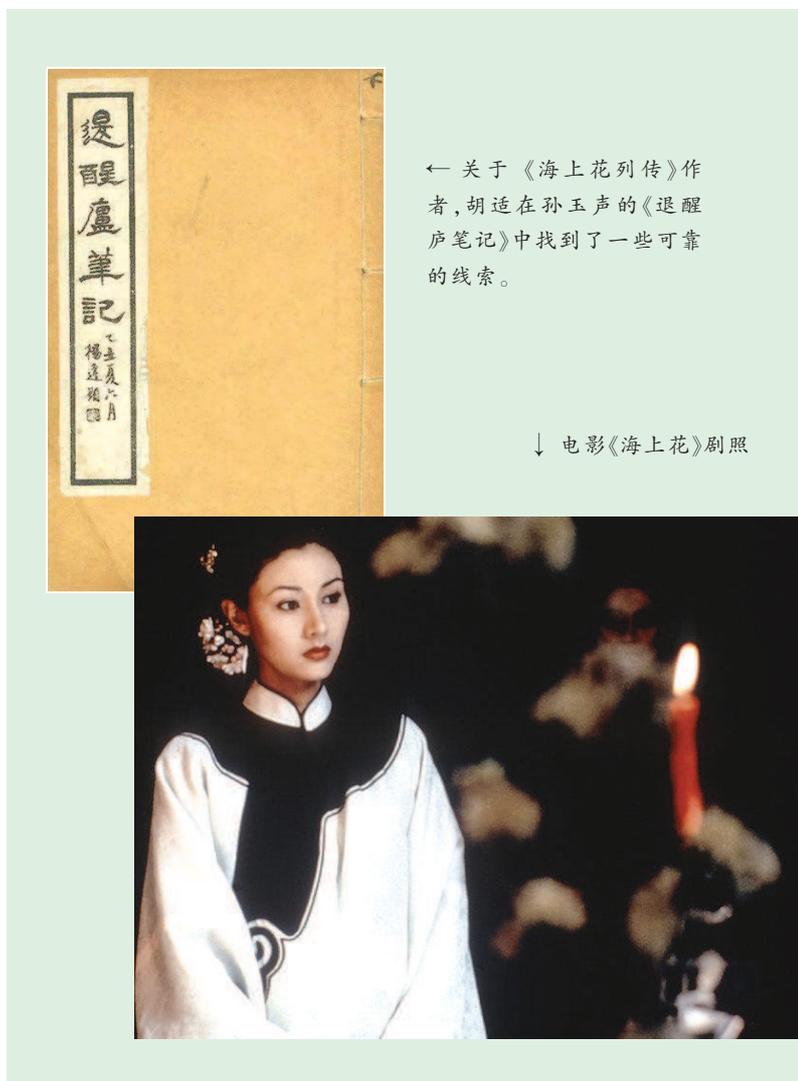
三是小说以吴语写作的价值。胡适认为苏州土白的文学的正式成立,要从《海上花列

传》算起,并且称赞作者的吴语写作读起来传神而耐人寻味,同时也承认方言小说在创作和流传上的困难,因而更加肯定作者创作的勇气和成果。胡适对这部吴语小说在文学史上价值的肯定,不由得让人联想到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对于以白话文为表现形式的新文学的大力倡导。

同胡适一样,张爱玲也对《海上花列传》极为赞许。她曾将《海上花》转换为标准的汉语,分为《海上花开》与《海上花落》两部分重印出版。此外,在1955年给胡适的信中,张爱玲就透露了将《海上花》翻译为英文的想法。根据现存的《海上花》英译稿看,张爱玲应当在上世纪60年代即开始了她的翻译工作,但是现存的译稿并不完整,可能与其曾经遗失有关。后来这份译稿经过整理,以及香港翻译家孔慧怡3年的翻译修订、润稿、编排,最终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

张爱玲对于小说开篇情境的洞察颇值得注意。她发现作者在《海上花》第一回的自序中声称此书是要揭发上海的妓女的狡诈,而在接下来的楔子中,作者又借着梦见自己在铺满花朵的海上行走,显示他对于妓女的同情,当他梦醒之时从高处跌落下来,至上海租界与华界交界的陆家石桥上,与小说的开场人物赵朴斋撞了个满怀。张爱玲认为这一段前言当是传统中国小说例有的劝善惩淫的声明,这开场白的体裁亦步亦趋仿效《红楼梦》的自序加楔子,而没有《红楼梦》的韵致与新意。她还敏锐地写道,这部分唯一的功能只会让那些汉学研究误入歧途。这倒是与前文所述那些对这部小说的诬蔑有着某些滑稽的类似之处。由于这样的缘故,张爱玲怕它无法引起英语读者的兴趣,在英译时删去了这个部分,我却以为这固然可以避免乏味的说教印象,却也抹去了对小说名字由来的解释,不免有些遗憾。

张爱玲认为,“花也怜依”写《海上花》最终还是写的一个“情”字,她在《国语本〈海上花〉译后记》中有一句话很值得注意:“《海上花》第一个专写妓院,主题其实是禁果的果园,填写了百年前人生的一个重要的空白。”这句话透着张爱玲独有的灵性,她能在一部专写妓院的小说中读出“情”,同时又能了解相距自己半个世纪的时代的人心冷暖,虽然只是不多的几个字却道尽了人世的沧桑。胡兰成说她是“民国世界的邻水照花人”,而晚清上海那纷呈的世态似乎也在她眼里倒映出别样的景致,或许生于没落世



← 关于《海上花列传》作者,胡适在孙玉声的《退醒廬笔记》中找到了一些可靠的线索。

↓ 电影《海上花》剧照

家的张爱玲在韩子云笔下的故事中曾找到几分共鸣吧。正如张爱玲对小说中许多细节的析赏,《海上花列传》虽以青楼为故事的主要场域,却少有俗艳的情节与文辞,有的只是娓娓道来的“平淡而近乎自然”的故事,而从小说对人物的刻画和情节的安排中,分明可以看到此间流动的“情”。固然,这“情”并非简单的爱情,也包含着“人情”“世情”,可见作者在撰写这部小说时所抱的诚意,与前面提到的所谓“谤书”一类的诬蔑实在是相去甚远。

关于《海上花》这部在他们眼中如此出色的小说为何始终不得广泛流转,胡适和张爱玲亦有着类似的观点。这个问题,前人已有两种解释:孙玉声在《退醒廬笔记》中认为这是小说通篇使用吴语带来的遗憾;“松江颠公”在《懒窝随笔》则对此提出异议,以为当时小说风气未开是《海上花列传》销路平平的主要原因。胡适与张爱玲的解释与他们相比则显得更加深刻,两人都将目光集中到中国文学的发展上去了,不过二者也有不同之处。胡适既肯定苏白对于《海上花列传》的流传带来的影响,又指出小说未能流行的真正原因在于它不是一般的文学作品,其中文学的风格与艺术在当时而言是超前的,因而不能为时人赏识。张爱玲则以为,《海上花列传》不是诞生得过早,而是过晚。她提出了

一个大胆的设计,即此书应当接续着《红楼梦》而出(当然这主要是指曹雪芹所作的前八十回)。《海上花》虽没有起伏较大的情节,却有着对于人物的复杂的刻画与平淡自然的叙述,在这一点上似与《红楼梦》一脉相承。可惜,《海上花》直到清末才出现,并且高鹗续作的后四十回《红楼梦》打断了人们对于小说的审美,人们的阅读趣味只钟情于那些传奇化的情节,因此《海上花》不能走红也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事了。对于民国年间《海上花列传》的再发现与再次被埋没,张爱玲归纳了两点原因:一是新文学在五四以后另起炉灶,使得大家忽略了这部既延续了传统又有所突破的小说,二是它又不像通俗小说那样能够满足人们的好奇心,有些“高不成低不就”的尴尬。

一部《海上花列传》自成书之日,经历了文学生命的几次生灭,其中有的人的因素、时代的因素,当然也有小说本身的因素。尽管,只是一个主要靠想象与虚构完成的文学文本,但这样的过程仍不免令人唏嘘。从某种意义上讲,胡适和张爱玲都希望《海上花》能够被广泛认可,并分别为此作了努力。胡适以对小说作者韩子云的考证和

为作者写作动机的辩护,发现了小说的价值和意义,而张爱玲则凭借她对文学以及对于世事的洞见,让人们从这部写实小说中读到更多的真情实感。这让人想起后现代主义常说的“作家在他们作品完成那一刻起就与这个文本没有了关系”。在成书之后,文本真的就没有自我言说的可能了吗?试想,如果没有胡适对于“花也怜依”身份的悉心查访,并努力为作者辩解,为其洗脱所谓为诽谤勒索而作书的罪名,是否还会有人以一种严肃认真的态度将它视为文学作品呢?如果没有张爱玲对于小说写作时代的理解和对作者在书中运笔的微妙之处的体察,或许有人会徘徊于文字的浮面,想要欣赏这部作品而不得要领吧。这不恰恰说明读者在虚构的文本面前,并不是单凭自己对文字的理解甚或臆测就能把握书的主旨的么?要想读出一本书的好,还是需要实处下些功夫的,这样才不至于曲解作者,埋没一部文学作品的价值。想要真正把握一部文学作品的价值,简单的依情节谈情节是不够的,还需要对作者本人和作品所处的外部世界有所认知,而在这方面,考据的功夫并非仅能解决版本、年代一类外围的问题,甚至还能从更深层次发现作品价值提供可靠的帮助。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